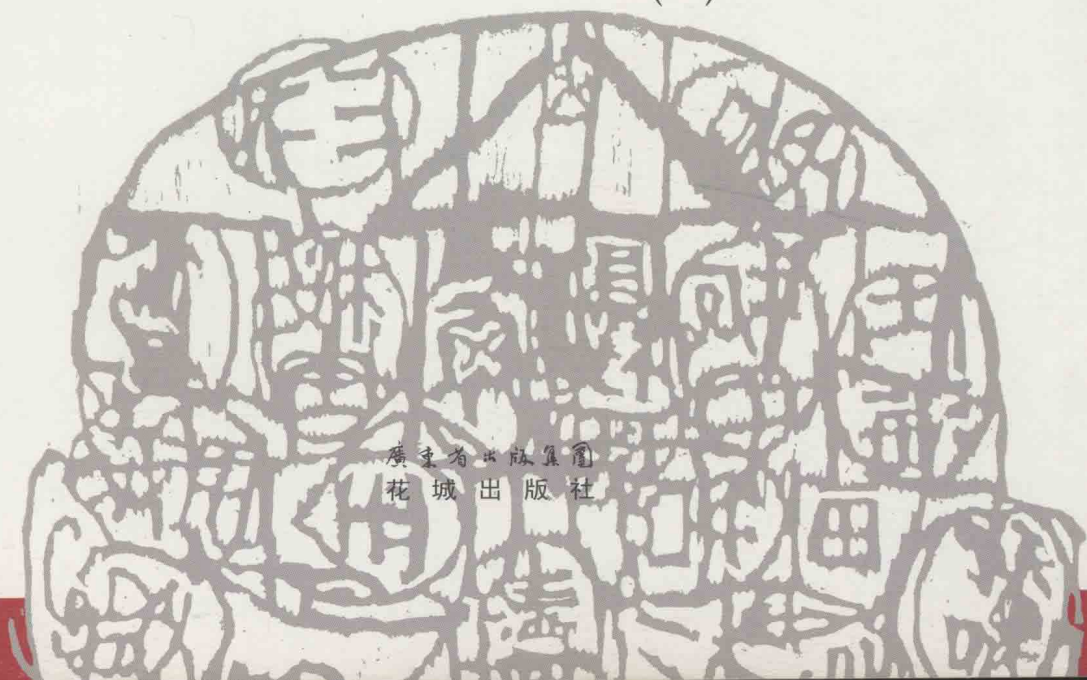


回到常识

——公众论坛演讲集(一)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回到常识

公众论坛演讲集(一)

执行主编 何雪峰 周筱赟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到常识——公众论坛演讲集 / 何雪峰, 周筱赟主编.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360-5424-0

I. 回… II. ①何…②周… III. 社会科学—演讲—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1441 号

责任编辑: 林宋瑜 揭莉琳

技术编辑: 易 平

封面设计: 全艺欣

内文版式: 罗子安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区中心路)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 让人人都有机会讲话

本书出版之际，适逢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遵嘱为序，眼前浮现出一位逝者的形象：平头，中山装，说话时生动的手势。他是耀邦。

如果不是检索史料，我已经遗忘，1980年初的胡耀邦，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这是一位难得的可爱的中宣部长，一位“决心把中宣部办成实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的中宣部长。

1980年2月9日那天，在出版界的迎春茶话会上，耀邦讲了个故事：子产不毁乡校。他是这样说的：

古代有一个叫子产的，郑国人，不毁乡校。唐朝的韩愈认为此事办得好，写了篇《子产不毁乡校颂》。乡校，大概是古代大辩论的场所，发牢骚的地方，叫“众口嚣嚣”嘛。子产刚开始负责任不久，“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就出来个“众口嚣嚣”。我们现在才三年多一点，多数人认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非常英明，办得对。但是，也有少数人就是不赞成，众口嚣嚣倒不是，但总有那么点“三五嚣嚣”。三五嚣嚣就叫他嚣嘛。我们应当采取郑子产的办法，“善也吾行”，对的我就采纳；“不善吾避”，不对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坏的，我就防止；“维善维否，我于此视”，是好是坏，我就观察一下嘛！采取单纯取消，单纯封闭的办法，不是最高明的办法。

其实耀邦这段话，并未正式见报。人民日报的报道，只提到胡耀邦同志提倡“大胆地有组织地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我工作的解放军报，进行了内部传达。这故事，在首都的同行中迅速流传。子产不毁乡校，说得真好啊！

许多年后的一个上午，当我坐在广东省科技图书馆的大厅里，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为梁文道先生主持演讲，见一位又一位听众，踊跃站起，提问，或

是加入讨论；有人率真，有人机智，有人激昂……便不由想到“乡校”。我知道这不是合适的比拟。我们21世纪的“乡校”，麦克风前摆满了微型录音机，网站工作人员正噼里啪啦打字、向无数网友作现场转播；眼前的大厅，更未必是“大辩论的场所”和“发牢骚的地方”，但它的确是交换观念、砥砺思想的“乡校”式空间。主办者将“讲坛”扩展成“论坛”，追求的，就是这个境界吧。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从“让人讲话”开始的。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正是从这个视角，我看到，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贵在“让人讲话”，功在“让人讲话”，而它的前瞻性意义，在“让人学习讲话”。

讲话需要学习吗？要的。如果我们所说的“讲话”，是指公民之间的充分探讨、切磋，甚至是观念的碰撞，学而时习，就不可或缺。

在台湾我见过这样的“讲话”，那是在龙应台文化基金会主办的“思沙龙”。我看到一个又一个严肃的话题——从认识欧洲到认识拉美、从反省战争到思考民主、从回望洋务运动到走近“五七”和“文革”——是如何吸引着教师、学生、商人、官员、主妇们，风雨无阻地前来。台湾民众的思考力、表达力、乃至讨论或争论时的修养和风度，都令我倾心。

在美国我也见过这样的“讲话”。那是哈佛校园，有一群男女学生坐在台阶上，听一位年轻人慷慨陈词。那年轻人，抑扬顿挫，神采飞扬，简直有总统候选人的气势；而那群学生，不时举手发问，陈述己见，不啻是一个个国会议员！其实眼前的聚会，不过是一位学长，在向刚入校的新生作有关校园的介绍。

我们不太喜欢开会。准确地说，是不喜欢“一言堂”的会，不喜欢言不由衷、套话连篇的会。但是在现代社会，让人人都有机会充分讲话，让代表不同集群的人好好讲话，让讲这种话的人和讲那种话的人能形成共识，或达成妥协，这样的会，还是很值得一开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有位叫罗伯特的军官，写了本教人如何开会的书——《议事规则》。这本书直到今天还有很大影响，世界上的许多会议，按照罗伯特设计的程序举行。孙中山先生很重视此书，他在组织班底编写《建国方略》时，翻译了这本书，称《民权初步》，后又将其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他为此写了下面一段文字：

夫议事之学，西人童而习之，至中学程度，则已成为第二之天性矣。所以西人合群团体之力常超吾人之上也。然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阙然无有。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以！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

这段话，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哲理。厉禁高悬，莫谈国事，不许众声嚣嚣，想要天下一律，结果造就的反是一盘散沙；而让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各执己见，自由表达，议论风生，却能训练出强劲的“合群团体之力”。这就是“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关系，“权利”与“责任”的关系。当每个人都自由呼吸，国家与社会能不血脉通畅，骨骼强健？

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已经举办了数十站。主办者用“站”这个字，而不是用“场”与“堂”，让人如见长长一列载满平民的列车，在绿意无边的岭南大地行驶。没有高调的鸣笛，没有风驰电掣的疾速，有的是每一“站”的生动精彩，和一“站”接一“站”持续的向前。人们在为遥远或并不遥远的、晴朗或风云变幻的前方，预备着思想、智慧和信念。我发现，《南方都市报》承办讲坛/论坛的第一站，请来的主讲人，是民政部救灾救济司的司长和两位慈善人士。十个月后再见到这位司长，是在汶川大地震的央视直播节目中。

我敬重登上讲坛的每一位讲者，也敬重步入论坛的全体论者。是的，这里没有听众，每一位都是论者。这里有无数独立思考的头脑、有一双双洞察世事的眼睛、有疑惑、有辨析、有不落窠臼的新念头，还有，这剧变时代独有的深深喟叹，忧国忧民的浓浓情怀。

遥望高远的目标，须有巨大的耐心与从容；俯察眼前的脚步，却要有寸土必争的紧迫感。为了那个“高度民主”的明天，我们抓紧每一次机会训练。我们是自己的教师，我们是自己的学生。大家一起写出了这本书，我们的“民权初步”。

钱钢

2008年7月4日写于香港大学圣约翰学院

001	香港十年，未来之路	梁文道
011	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官家主义和潜规则	吴 思
024	从股市泡沫之争看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吴向宏
036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遗产	葛剑雄
048	黑窑奴工与底层的生存生态	孙立平
060	业主自治，现代公民的摇篮	孙威力
072	如何看待物价上涨	秋 风
080	一切为了克服过去	王 选
	——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	
091	从“纸包子事件”看中国的媒体现状	展 江
102	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分化和对立	徐友渔
114	人才至上，还是公正至上？	许纪霖
	——高考恢复三十年的反思	
128	从公民社会走向和谐社会	陈健民
137	俄罗斯知识分子给人类的启示	王 康
145	有报天天读：与国人同悲同惜，心灵相通	杨锦麟
155	普遍幸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王占阳

163	解读和谐社会：问题和对策	于建嵘
175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城市	章仁彪
185	回归常识	资中筠
	——现代化道路中的几个误区	
196	广州城市发展的挑战与方向	袁奇峰
207	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	朱学勤
220	解读新劳动合同法：劳资关系怎么平衡	郭巍青
230	回望 1917：俄国十月革命 90 年	金 雁

香港十年，未来之路

演讲嘉宾：梁文道

演讲时间：2007年6月23日

嘉宾介绍：香港文化人。17岁起开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见于《信报》及《明报》的专栏版；1998年起，开始参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曾为多个文化艺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担任董事、主席或顾问之职；曾于香港理工大学及香港大学当客席讲师。现职商业一台总监、牛棚书院院长、绿色和平组织董事、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顾问、凤凰卫视中文台《铿锵三人行》及香港电台节目《打书钉》主持。

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

今天是来跟大家讲香港回归十年以来的种种情况。昨天下午在凤凰卫视录制节目，在录节目时有同事聊到，全国媒体都在做香港回归十年。同事说起一点，香港现在有什么好东西呢？有人下了这么总结性的话，如果香港不变，这十年来没有变，那就是最大的好处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这

几天香港有另外一个大新闻，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刚刚辞职了，因为有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说她的工作出现了错误，事情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这位官员打电话到一家大专院校，打给副校长，说你们学校有两个学者做研究，要把这个研究的结果跟自己的感想发表在报纸上。这两个学者想讲什么呢？他们是想批评香港



政府这六年来的教育改革，而这六年来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这位官员在推动，所以她很不满，怎么能任意批评教育政策呢？她说要把他们炒掉。

这件事后来被捅出来，香港就要处理这件事。如何处理呢？我认为香港不变的东西，就是处理方式没有改变，首先就是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是香港政府向来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问题，政府部门出现了错误，出现了很重大的社会争论，要查清真相，政府要尽量避免自己调查自己。为什么呢？自己调查的话，会给人一个官官相护的感觉。那么，该怎么调查呢？两个渠道，由香港立法会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者政府本身也可以找人来调查，会找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为香港讲司法独立，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然后请两三个社会上名望非常高的人，请他们出来构成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小法庭一样，现任的被认为可能出问题的官员，比如说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来应询，这些被告的官员要聘请律师，或者由政府出钱帮他们找律师。

比如在这次事件中，那位接到电话的副校长说了，就是这个官让我炒学校的教授，这不行。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师，大家谈了一个半月，结论出来了，就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并没有证据证明教育局秘书长罗范淑芬真的曾经叫这个副校长炒掉批评政府的学者，可即便如此，她的确打过电话给那位副校长，对两个学者做研究、发表文章批评政府感到不满，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后，尽管这位官员觉得很冤，觉得自己没有干过，但最后还得辞职。

这是香港第一个没有变的地方：处理此类问题有独立调查委员会，在社会上的声望很高，出来的报告即便被批评的官员不满也没有办法，只能选择辞职。香港回归十年，对于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标准，仍然是严格到这样一个地步：哪怕是一个政府官员打电话到一个大学，跟这个大学说你们怎么有这种学者，写这种文章批评政府，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这仍然是不能做的，因为官员是不能够打电话到学校去批评他们的学者为什么批评政府，这么做就等于是干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了，所以这个官员要辞职。

以整个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件事让我非常的高兴。这应了昨天我在凤凰卫视同事所说的，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十年以来这个东西都没有变。但是我却有一个疑问，你能说香港十年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吗？这让我想起讲香港问题，一直说它是一国两制，然后是五十年不变，什么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呢？这个概念就非常特别了。

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

我们知道，“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这个伟大的创意，针对的是香港回归的独特情况，而香港回归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今天想在这里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外，世界上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结局，就是在去殖民地化后独立。但是，香港是一个例外，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殖民地，去殖不是独立，而是回归母国。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去殖的问题，世界殖民地史上可供参考的去殖经验在香港很难发挥。

其他地方的去殖经验非常丰富，比如说去殖之后很多地方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独立之后甚至所有的路名都会改掉，或者要做很大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化，但香港都没有经历这些。香港这个地方，经过去殖，但是这个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别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经过几十年漫长的斗争、挣扎、批评、自省，甚至独立之后还要继续惨烈地流血，而香港的去殖在很快乐的一夜之间完成，回归那天晚上维多利亚港有无数的烟花和鞭炮，群众都是喊着欢呼声。

为什么在整个回归的历程中，从中英谈判开始，一直到今天回归十年，去殖两个字从来不是话题？我觉得这是今天把握香港问题，或者是看香港必须要注意的切入点。如果不谈去殖，回归又是什么呢？其实，回归就是去殖的独特形式。

首先我们这么理解，如果回归指的就是彻底回归中国的话，那它就不应该是一国两制，应该是一国一制。那为什么要一国两制呢？回归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今天大家都觉得回归了，但是很多的批评，认为香港和内地还是有很多的隔阂。我常常跟人解释说，回归仅是香港人对内地认知的隔阂，我们看新闻，内地的领导人说香港人时往往会说“香港同胞”，为什么不说“上海同胞”？“同胞”这个字眼正好暗示，其实你还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国两制是一种很特别的设计，这个设计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让香港的主权回归，而不是整个体制的回归。1997年回归我们特别关心的是主权回归，请

注意这一点，于是这个去殖就变成了主权回归，主权回归意味着你的制度不变。那表示什么呢？容我大胆地说一句，就等于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价值、文化习惯等都保持下来了。所以它是一个去殖了的“殖民地社会”。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在去殖后几乎都是独立，像在非洲，独立之后我们还可以说它是殖民地社会，因为它的体制没有改变，它的社会结构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从来不只是一种主权问题，没那么简单。

香港的回归，我们讲的就只有主权的回归，而没有碰下面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今天讲香港不变就是最大的好处，这句话其实很荒谬，如果说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那就是好处，那不等于大家要承认殖民地是很不错的东西吗？我是不是因此反过来就主张我们马上推倒一国两制，让香港一国一制算了，不要等五十年，是不是要这样呢？当然也不是。我们知道，一国两制的出现，是为了处理香港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非常需要香港这么一个在自身体制外的独特结构，这对中国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 1949 年立刻收回香港？当年的解放军已经开到深圳，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了。中央电视台拍过一个纪录片《香港百年内幕》，解放军已经在罗湖那边遥望香港，为什么不过去呢？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宣布不承认过去的平等条约，在法理上、军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为什么不收呢？理由很简单，传说是周总理的八字真言：“长期利用、好好打算”。香港当年对被国际封锁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创造外汇，以及在海外的各种技术、各种人员的流通渠道都要经过香港。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矛盾，首先我们要承认保护领土的主权完整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又必须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暂时妥协这个领土完整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让香港继续做一个殖民地社会。另外一个原因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的信心问题。当时大家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体制，相比较起来，缺乏信心，特别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诉香港人，你们不要怕，你们放心，你们仍然像过去那么生活，这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邓小平甚至还说过，如果五十年不够的话，一百年都可以。

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香港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讲难听一点是难民社会，香港从来就是一些逃离内地的人去的地方，从清末一直这么下去，1949 年去过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去了一批，大家

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家庭回忆下长大。

为了安稳信心，所以说“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但是很吊诡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用我的讲法，封存了主权之外的殖民地所有条件、所有结构保存了，去殖后，这个社会原来的殖民地特色是没有改变的，这就是香港一个很独特、很独特的地方。今天要理解我们看到的很多香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都必须要从这一点来把握。

我再问一个问题，很多人说香港人还有没有殖民地心态，香港人难道从来不说去殖吗？难道从来没有反过殖民地吗？错，当然是错的，这绝对是有。这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认同问题，这个一会儿再说，我先说比较硬的东西。比如说政治，我说什么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香港的政治体制、政府结构等，都是原来殖民地特色的。过去，大家常常说香港的公务员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很廉洁，政治中立。我曾经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有一场辩论，我批评说，你们所说的这些都是假的，香港从来没有公务员政治中立过，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比如英国，快要大选了，保守党可能要上台，政府可能大换班，但连邮差都要换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务人员里划一条线，邮差、警察、消防员，甚至一个政府部门里某些政策执行官员，这些人不能碰，谁上台他们都留着，维持政府稳定，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哪一个党上台我就听谁的，我就帮他打工，甚至我昨天还在执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党推翻了，今天的政党说这个事别干了，好的，照办，这就是政治中立。这帮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选官员负责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务员中立呢？香港过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务员，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是港督搞出来的吗？其实大部分的政策决定都是公务员决定的，既然是这样，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香港向来是假装政治中立。这有什么好处呢？举一个例子，我右手边是资本家，左手边是劳工。这帮劳工跑到政府来说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权益，设立最低工资，资本家就说不行，设立最低工资就增加营商成本，我们就垮了。这种政治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争论，涉及到政治价值的选取。而香港，我是公务员，我没有政治立场，我政治中立，那我怎么裁决呢？我按既定程序来处理。我先搞咨询，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意见收回来，然后看这个意见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见比较多，那个支持劳工的意见也挺合理，可是我查过了，根据我们政府过去的一些档案、资料、法律文件，这个很难落实啊，可行

性不高啊，订立最低工资有法律上的条文要修改，很麻烦，所以抱歉，我现在依据程序理性的原则，告诉各位，这一回你们要求最低工资干不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公务员，他在假装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谁都不帮的，他处理所有的问题都是用一条官僚语言来处理，按照既定程序，原有法律条文是怎么做的。用这样的方法，港英政府过去很巧妙地凌驾于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上，因为这些矛盾是你们社会自己在矛盾。而这个社会从来不愿意集体来挑战殖民当局，因为殖民政府有一个很优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同盟”，在这个社会上找一批各行各业的精英出来，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员会或者立法委员会等，按照功能区分。比如说这里是商界，那边是劳工界，前面是法律界，然后还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听各阶层的意见。这么一来，大家都不骂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说法律界就骂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几，为什么他们两个代表，我们就一个，我们也要多一个代表。社会彼此吵架，然后内部也吵架，比如说法律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凭什么这个小子代表法律界，不是我呢？就变成各界之间彼此勾心斗角，政府很超然。

香港不存在“人心回归”问题

港督选人也是依据这样的原则，而这帮精英绝大多数都是商界，商界的声音非常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香港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迟推行免费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为什么？当年有港督曾经想过，其他三小龙都九年义务教育了，香港也应该实行，否则人力素质上不去。结果是商界反对，因为政府搞义务教育，政府财政支出要增加，这就要加税，商界是反对加税的。当年商界的想法是，什么都可以市场搞定。

这整套原则，到今天香港还是没有改变。我们知道，现在的香港是“港人治港”，再没有港督，而是选特首，由八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这八百人是哪些人呢？延续了过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全世界都有贫富差距的问题，香港也有，内地同样也有。贫富差距在香港同时反映在制度设计上，最有钱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时也是最有政治权利的人。这就是我描述的香港基本情况，其

实是没有改变的。这个不变之后，问题就来了。

如果香港不是保持殖民地体制，而彻底的回归中国，包括各种制度形式都回归中国，可以不可以呢？我刚才说了，好像很难。但是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就是彻底的去殖，比如香港这几年一直在争普选，如果普选又怎么样呢？早在中英谈判时，英国人想尽快实施香港市民普选特首和立法会，中方的意见是，这个不是还政于中，而是还政于民。还政于中，就是还政于中央政府，才真正的回归，香港市民选特首暂时还不行，前提是人心要回归。

这牵涉到下一个问题，假如香港由于种种原因，制度上不能彻底的回归，和内地接轨，又不能普选，那么回归还能有什么内容呢？香港只有主权回归，主权回归之后，最近香港很流行的一句话，“人心回归”。那么，什么是人心回归呢？简单来讲就是有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说到认同感的问题，我想提出一点，有一本内地学者写香港史的书，有一种很荒谬但很有市场的观点。他说，英国人统治香港时，很刻意地要培养香港人对英国的认同感，要香港人认为自己是英国王室的子民，让香港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诸如此类。为什么我说这种想法说法完全荒谬呢？因为这些学者恐怕基本的研究都没有做，如果他们在1997年之前到过香港，随便找一本中学课本，或者随便走进一家中学，没有一家中学在教英国历史，相反绝大多数中学都有专门中国史课。

英国政府从没在香港推行过所谓的对英国认同的教育，为什么？只要对殖民地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英国的殖民跟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很不一样，别的国家搞贸易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英国夺取殖民地是为了搞贸易。英国人不想碰你的民族认同问题，所以香港人向来都很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李小龙的电影里都是这么说的，“我们中国人”、“你们鬼佬”等等。比如说最近端午节，有龙舟水，广州人有这样的概念，香港也保存得很好，端午那天年轻人都要游龙舟水，这是吉祥。香港特别多这些中国传统的东西。香港人的认同，是认同我们是中国人。英国人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硬要几百万香港人认同英国，一定会造反，统治的难度会非常大。

香港如何真正完成“去殖”

但是，香港人的认同真正有问题的地方，就是没有很实质性的国家认同，香港人有很深厚的文化认同、血缘认同。问题就来了，今天说人心回归，又面临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想在香港推行人心回归，就不应该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因为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应该是政治的。可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香港又很难推行实质性的政治认同，所以只能天天说“香港人要爱中国，不要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这样香港人又感到很怪异，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怎么还要天天说，就像我姓梁，我爸天天跟我说，别忘了你姓梁啊。

我曾经和一个内地官员在香港聊天，他说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很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比如说开两会，内地媒体一定会把两会新闻放头版，但香港的报纸，什么《苹果日报》、《东方日报》，居然还在讲着一个富商的情妇从楼上跳楼自杀的，这不像话，不关心全国人民关心的话题。我向他解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两会和香港没多大关系，比如取消农业税，再比如改变纳税人报税的方法，哦，是吗，你们改变了，但所有国家的重大决策都来不了香港。香港人和广州人，真是同门同种，大家都是讲广东话，但从来没有休戚与共的政策上的现实感，原因就在于两制嘛。

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既然是一国两制，你就不可能让香港人产生真正很现实的国民认同感。由于香港人没有很现实的国民认同感，所以某些政府部门又觉得香港人没有人心回归，由于认为香港人没有人心回归，所以就觉得香港人都是一帮很可疑的人。比如说我，我就觉得自己是有原罪的人。我常常在内地写文章，发表很多对内地的批评意见，结果有网友就到凤凰论坛骂我，就说我这个人在殖民地长大，是满脑子英国人的坏种，老是侮辱中国人。我说了什么呢？我好像是说故宫星巴克的问题，我说这是故宫形象和旅游形象的问题，就看你整体的定位。我说这一番话，就给人骂是汉奸了。

我发现很多话，如果内地同行出来说，大家就说他忧国忧民，我说了，就是汉奸。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原罪。我的原罪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在殖民地长大

的，这是香港人的原罪。既然有这种原罪，现实的认同感很弱，那么香港人就不算是彻底的中国人，所以还叫香港同胞，不是香港市民，所以还不是百分之百的可以信得过，所以普选什么的，都是有危险的，要先缓一缓，就这样一直卡在这里。

这几年香港的政治问题，或者是爱国问题，我觉得就像是一对情侣，一直追问对方到底爱不爱自己。如果爱，请证明给我看，你不证明我就不信。比如说香港特区公布特区政府班子，就很强调一点，这个班子是爱国爱港的。各位，我们何时见过，内地某地换市委书记，会很强调新的市委书记很爱国？爱国在内地不需要讲的，没有人说他能当市委书记，是因为他很爱国。但在香港不一样，爱国怎么去证明呢，于是香港就出现有一种怪异的现象，一些商人、一些政治人物，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表现爱国。比如说曾荫权接任董建华出任特首，消息刚刚传出来，香港记者拍到这么一组画面，曾荫权在上班路上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记者想，这是不是一朝得志呢？于是问为什么这么轻松，吹什么口哨？曾荫权回答，我在吹国歌。还有些商人，过去的港英合作精英，到了1997年之后，突然出来说，当年抗日的时候，我曾经偷偷捐钱给东江纵队。香港有一个名词，叫“忽然爱国派”。

这是香港的一个问题，去殖是没有真正完成的去殖，怎么办？很多人卡在这里。怎么走出去，我觉得要开展真正的去殖运动，我觉得香港的民主运动要定位于“去殖运动”的角度。比如香港现在拥有的言论自由，不是天掉下来的，而是香港人争取回来的。我记得当年刚刚开始在香港做戏剧、小剧场、剧评的时候，话剧剧本是要审的，数十人在街上聚集，警察就可以说你犯法了，而现在五十万人都可以上街游行，可以随便地讽刺政府官员，这一切都是争取回来的，这都是反殖的特征。过去香港的左派为此付出很多的代价，如果没有他们，今天香港工人的生活要惨多了。今天说民主运动，其实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脉络来看，我总觉得，香港所有的民主派和左派，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去殖运动在时间上的先后而已。

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实际的困难，包括怎样处理两制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香港问题有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的特首和立法会最终是要由普选产生的，基本法写明的，“最终”。但是，一国两制又是什么呢？一国两制不是无限期的，一国两制是有限限